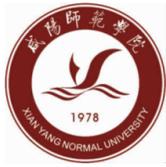


咸阳师范学院报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ewspaper



陕西省高校优秀校报

主办:中共咸阳师范学院委员会
编辑出版:咸阳师范学院报编辑部
主编:李广生 副主编:李永涛

国内统一刊号:CN61—0817 / (G)
出版日期:2022年11月30日
总期数:358期(本期四版)



抖音二维码



微博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二十大精神集体备课会



二十大精神学校报告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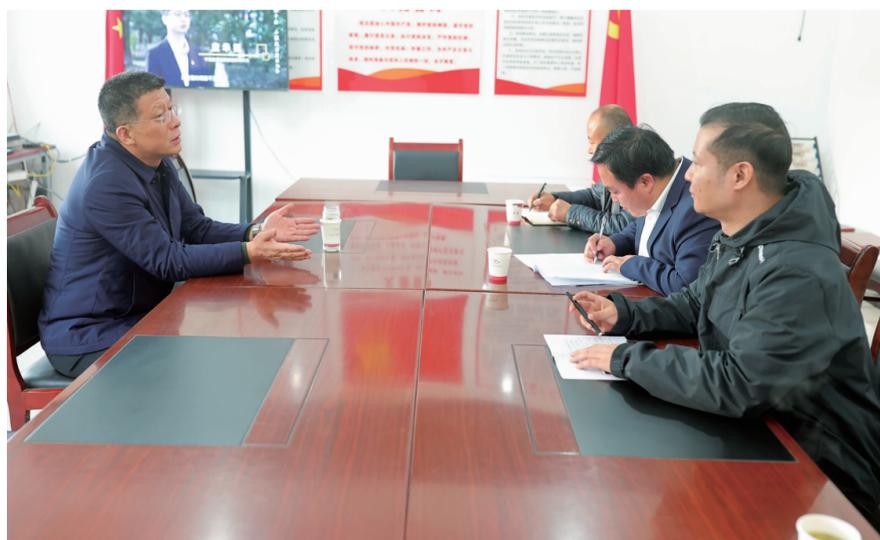
纪委学习二十大精神



工会组织学习二十大精神



统战学习二十大精神



赵书记参加省级单位驻旬帮扶团联席会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新生开学典礼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二十大交流学习会



我校团委举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我校召开科研诚信警示教育 and 自查自纠工作专题会

本报讯 11月14日,我校在第三会议室召开科研诚信警示教育 and 自查自纠工作专题会。校长舒世昌出席,副校长张弘主持。

会上总结了我校科研诚信专项教育整治活动工作情况,对此次科研诚信警示教育和自查自纠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文学与传播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设计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代表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

舒世昌指出,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科研诚信警示教育和自查自纠工作,把师德师风建设同此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对科研诚信建设重

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加强政策宣传,深入开展科研诚信警示教育和自查自纠工作,营造氛围,确保文件精神传达到位,工作落实到位;要建立完善科研诚信档案和科研失信人员数据库,加大科研诚信案件查处力度。

科学研究处、党委组织部、党政办公室、学科建设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工作处、档案馆负责人,校学术道德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各二级学院院长参加了会议。

(科学研究处 供稿)



我校学子在 2022 年陕西省“正大杯”大学生就业创业实战大赛陕西省总决赛中获得佳绩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共青团陕西省委、正大集团主办,正大集团陕西分公司承办的 2022 年“正大杯”大学生就业创业实战大赛陕西赛区落下帷幕。本次比赛,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队伍从 840 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晋级陕西省赛区 20 强,成功进入陕西赛区复赛。经激烈角逐,获得第 7 名三

等奖、1000 元奖金和免试 offer 的好成绩。本次大赛,全面提升了我校学生的综合能力,深入挖掘了我校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达到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教学目的,进一步落实了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方针。

(经济与管理学院 供稿)

我校基础教育荣获 2021-2022 学年度义务段学校教育质量先进单位

本报讯 近日,渭城区教育局下发了《关于表彰 2021-2022 学年度义务段学校教育质量先进单位的决定》(咸渭教字〔2022〕378 号),附属中学、附属小学荣获 2021-2022 学年度教育质量先进单位称号。

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将以此次表彰为契机,继

续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凝心聚力,争先创优,大力发展素质教育、持续深化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更优的教育教学质量为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附属中学 供稿)

陕西省科技期刊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本报讯 为了提升综合性高校学报办刊质量,11月4日,由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我校学报编辑部、科学研究处承办的科技期刊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渭城校区召开。本次研讨会以“综合性高校学报集群化协同出版和特色差异化发展”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副校长毛龙灿、陕西省科学技术学会副会长何帅、陕西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石应江出席会议。

毛龙灿在致辞中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和《咸阳师范学院学报》自创刊以来取得的成绩,希望学报结合学校办学实际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转理念、创思路,不断提升办刊质量,助力学校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何帅介绍了举办陕西省科技期刊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的目的,希望通过相关学术研讨活动多举措、多途径助力我省学术期刊的发展。石应江指出,我省学术期刊应“立足陕西、面向全国、放眼世界”,重点放在科技期刊培育、主编沙龙、复合型编辑人才培

养、办刊模式探索上,引领学术期刊向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转型。

研讨会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李明德教授作了《着力推动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协调发展》的主题报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杜敏教授作了《知识服务与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报告;我校学报副主编赵正作了《综合性高校学报集群化协同出版再探讨》的主题报告。

此次研讨会探讨了综合性高校学报集群化协同出版和特色差异化发展,有助于形成产学研协同发展,促进陕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宝鸡文理学院、渭南师范学院、安康学院、榆林学院等省内综合性高校学报主编及编辑以线上形式参会,我校科学研究处、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学报编辑部 供稿)

我校学生在 2022 年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团体舞)线上赛中喜获佳绩

本报讯 11月6日,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体育舞蹈分会承办的 2022 年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团体舞)线上赛顺利落下帷幕。

此次比赛由我校体育学院陈小龙担任领队,青年教师李琳、黄俊担任主教练,舞蹈表演(体育舞蹈)专业 14 名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专业丙组校园集体舞 C 组一等奖一项、专业丙组校园集体舞 J 组二等奖一

项,创体育学院建院以来最好成绩。此次参赛是我校体育学院舞蹈表演专业成立后参加的首次比赛,充分展现了我校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专业功底,彰显了体育舞蹈的精神内涵。

本次大赛自今年 6 月启动报名至比赛结束,历时 5 个月,共有来自全国 98 所高校的 2230 名运动员参赛,是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历史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团体舞赛事。

(体育学院 供稿)

我校学生获评 2021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本报讯 近日,2021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获得者名单揭晓,我校化学与化工学院生物科学 2019 级学生张雪获评 2021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

2021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评选活动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指导,评选对象为在投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乡村振兴、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弘扬网上文明、助推学术和科技进步等方面有突出事迹,在当代大学生中能够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榜样典型。经基层推荐,组织评定和公示等环节,全国最终产生 10 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1832 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奖学金获得者。

张雪,女,汉族,共青团员,入党积极分子,化学与化工学院生物科学 1901 班学生,校学生会干部。在校期间,刻苦奋斗,成绩优异,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能力大赛—陕西省一等奖、“钉钉杯”英语作文比赛—全国优秀入围奖;作为第三编委,参与编撰出版《延长县药用植物图鉴》一书。因表现突出,获评咸阳师范学院“优秀学生”“优秀共青团员”“科技创新先进个人”“社会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校团委 供稿)

我校获批省级(含省级)以上 87 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公布 2022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的通知》(教高司函〔2022〕10 号)文件和《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2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的通知》(陕教高办〔2022〕35 号),我校省级(含省级)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 87 项(创新训练项目 79 项,创业训练项目 5 项,创业实践项目 3 项),其中国家级立项 24 项,由呼浩楠学生主持的“黄河流域陕西段民间艺术文化记

忆及文创设计研究”项目为国家重点支持项目。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通过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旨在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创新创业能力训练,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

(教务处 供稿)

我校师生在 2022 年陕西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陕西分赛中喜获佳绩

本报讯 近日,省教育厅发布《2022 年陕西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陕教高办〔2022〕33 号)文件,我校学生荣获 21 奖励,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13 项、优秀奖 21 项。由设计学院教师岳花娟指导的“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 IP 形象设计”、孙楠和鄢琳指导的“守护——警示灯井盖再设计”、杨静指导的“大秦健儿叠叠积木设计”3 项参赛作品被推荐参加国赛。设计学院教师孙楠、

岳花娟、鄢琳荣获“优秀指导老师”称号,鄢琳荣获“优秀组织者”称号,我校获“优秀组织单位奖”。

2022 年陕西省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陕西分赛由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累计收到省内外 53 所高等院校 3302 件参赛作品,参赛院校及作品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设计学院 教务处 供稿)

我校召开 2023 届毕业生就业暨升学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11月23日,党委副书记周群英主持召开 2023 届毕业生就业暨升学工作推进会,校长舒世昌出席会议。

舒世昌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关学校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声誉。当前正值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多变等因素影响,市场用人需求明显下降,今年我校毕业生人数达历史新高,就业形势严峻复杂,就业工作任务异常艰巨。

舒世昌强调,全校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深刻认识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全体就业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要明确职责分工,要狠抓任务落实;要加强学风建设,强化升学指导;要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更细的推进举措、更实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我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周群英要求,全体就业工作人员要认真领会本次会议精神,要落实“一把手”工程,尽早部署实施,做好就业动员,抢抓就业黄金期;要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建立毕业生就业台账,加强分类指导,精准推送就业岗位;用心用情做好指导服务,密切关注毕业生求职期间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态,充分调动毕业生就业主动性,确保就业工作稳定安全。

会上,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全面总结了 2022 年就业创业工作,宣读了《2023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学生工作处负责人总结了 2022 年升学工作,安排部署了 2023 年升学工作;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升学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分别作了经验交流。

党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招生就业处、学生工作处、教务处、人事处、财务处、保卫处、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后勤保障处、校团委相关负责同志以及各二级学院党委书记参加了此次会议。

(招生就业处 供稿)



语言·伦理·身份——朱利安·巴恩斯

《福楼拜的鹦鹉》中的后现代鹦鹉意象

宫昀

(咸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984) 是英国当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成名之作。小说中两只鹦鹉标本的真实身份之辨常被此前研究者解读为象征真实与虚构、客观存在与艺术再现的关系等。埃里克·伯拉茨基(Eric Berlatsky)洞察到《福楼拜的鹦鹉》中鹦鹉意象的虚幻性和模仿性。他认为,与鹦鹉相关的真实事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模仿,甚至成为对模仿的模仿”(Berlatsky 2009: 189)。伯拉茨基的结论,是基于小说中提到的报纸上的新闻事件得出,不能概括书中多次出现的鹦鹉意象的全部功能。彼得·柴尔兹(Peter Childs)对鹦鹉意象的讨论认为:一方面,主人公布莱斯韦特(Braithwaite)对鹦鹉标本身份的追寻,是对作为作者的福楼拜身份传记式研究的转喻;另一方面,巴恩斯借鹦鹉机械重复人语的行为,暗指某些平庸作者文学创造性的匮乏(Childs 2011: 48)。柴尔兹的解读触及了鹦鹉意象题中之义的多个方面,但未进行更深入探究。国内学者张和龙以《福楼拜的鹦鹉》作为“元小说”批评文本,解读其中的鹦鹉意象。他认为,一方面,“巴恩斯通过对鹦鹉原型虚幻性的揭示,对艺术再现现实或揭示真理的传统认识论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对鹦鹉意象的探寻“是整部小说对批评行为本身的隐喻性戏仿”(张和龙 2009: 4)。张对小说中鹦鹉意象的后现代叙事功能的把握是恰切的,但受研究主题所限,未涉及鹦鹉重复人语、象征女性不忠等问题。多位学者从不同侧重对鹦鹉意象的探究和解读,为本文对《福楼拜的鹦鹉》中鹦鹉意象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在探究鹦鹉意象过程中,搜集到多个有涉鹦鹉的经典文本,如奥维德(Ovid)《恋情集》(Amores), 乌尔都语民间故事集《鹦鹉故事》,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一颗简单的心》(A Simple Heart),蒙提·派森(Monty Python)“死鹦鹉”(“Dead Parrot Sketch”)等。本研究未囿于巴恩斯小说本身,这些文本与《福楼拜的鹦鹉》的互文阅读,一方面反映出鹦鹉意象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共通与流变,另一方面反映出巴恩斯对鹦鹉意象运用所涉主题的丰富性,以及对本小说在经典文学版图中的地位的确证。

在题为“蒙提派森与玛斯纳维:印度语、波斯语和英语幽默中的鹦鹉意象”一文末尾,作者约翰·R·佩里(John R. Perry)指出,在从古到今、从东到西的文学传统中,鹦鹉主题反复出现的原因是,“它们处理的是普世命题,如人类语言、性的不可靠和自我的身份”(Perry 2003: 73)。佩里言中鹦鹉意象处理的这三个普世命题,在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中得到恰切印证。这一巧合的必然性在于,从根本上看,这些命题都关注鹦鹉因其能重复人的语言而被赋予的、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殊的文学功能。在佩里言中鹦鹉意象的三个普世命题框架之下,本文研究注重鹦鹉与作者的对位关系,鹦鹉与女性性背叛者的对立或依存关系,以及鹦鹉身份与后现代叙事者身份的虚实关系。巴恩斯借鹦鹉探讨作家和语言、小说真实和历史虚构的关系,行文中带领读者玩味这些命题的复杂性及模糊性,借此对文学文化史中与鹦鹉有关的语言命题、伦理关系和身份讨论进行深入反思,并在长远意义上从多个维度将该小说纳入文学传统。

二、“人类语言”

对鹦鹉和作家来说,人类语言是唯一可供运用的表达载体。鹦鹉能言人语,它的行动或出于无意识的模仿,或出于其主人的有意调侃,都不具备自觉性。作家中有出于功利目的的平庸的写作者,有被上帝选中的天赋型写作者,也有福楼拜一类呕心沥血的勤奋型写作者。平庸的写作者,就像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者,语言仅是他们的普通劳动工具;对鹦鹉和天赋型写作者来说,语言是无意识的流淌,不必施以额外的关注;只有对福楼拜一类勤奋型写作者来说,语言的缺陷、风格的诉求、自身的技术等方面才会产生张力,造就写作的困顿与魅力共存。鹦鹉特出于其他动物的能力在于它能模仿人语,因此鹦鹉意象首先与语言,尤其是作家的语言联系在一起。《福楼拜的鹦鹉》以鹦鹉为中心意象,活的鹦鹉是像作家一样受困于语言,却不得不诉诸语言的有限表达者;鹦鹉标本,如同作家最终成型、交付出版的作品,是固化的语言本身。作为后现代写作者,巴恩斯的困顿在于他认识到,语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作家必须运用语言表达自己,别无他法。意义一旦以语言建构之后,有着其不可更改性和霸权性。作家必须依赖语言,甚至受制于语言;另一方面,语言无法穷尽作家想要表达的意义,全然的表达总在某个不可抵达之处。

《福楼拜的鹦鹉》的表层叙事与鹦鹉意象的对接,主要由叙事者布莱斯韦特在两处福楼拜纪念馆发现的两个鹦鹉标本来实现。叙事者追索鹦鹉标本的身份,了解福楼拜其人其作的过程,也是巴恩斯思考作家与语言关系的过程。福楼拜写作《一颗简单的心》时,曾从鲁昂自然博物馆借用过一只鹦鹉标本,作为刻画露露的参考。福楼拜笔下的鹦鹉露露,被女主人公费莉西泰(Félicie)视为圣灵的化身,因为在她看来,“天父显示自己,不会挑一个鸽子的,因为这类飞禽没有声音,倒是挑露露的一个祖先可靠”(福楼拜 2017: 95)。基督教教义中,人的语言能力与圣灵联系在一起。据《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中的说法,圣灵的象征物有二:燃烧的火苗和张开翅膀的鸽子。福楼拜有意费莉西泰之口,将圣灵的象征物由鸽子替换为鹦鹉,因为后者与圣灵

(或语言)的实际联系更密切。在《一颗简单的心》中,露露的身份具有二重性:当它活着时,它的鹦鹉学舌虽以人类语言来表达,却是无意义、无意识的机械重复。当它死去时,它被费莉西泰设法制作成标本长久保存,摇身一变成为恒定的能指符号,“它立刻转化为可以保证一切意指活动稳定性的超验能指,亦即圣灵”(Donato 1984: 719)。作家运用语言进行创作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必须不断对语言进行尝试和打磨,以期达到自己想要的风格。此时的作品是不确定的、生成中的,仅属于作家本人的;另一方面,作家不得不将风格以能指的形式固态地保存下来。出版的作品,对读者而言是有意义的能指体系。但对作家来说,它却已经死了。它未能穷尽作家想要表达的风格,却不得不定格在实体的书籍中。难怪福楼拜说,“书籍的目标是写作,而不是出版”(罗兰·巴尔特 2008: 126)。他写作的本意不是为了最终固态的形式,而是写作的过程。对死去的鹦鹉来说,它被制成标本,从重复无意义言语的有机体变成了稳定的超验能指本身,获得某种恒久意义。对出版书籍的作家来说,他运用语言表达自己,最后不得不陷入言不尽意又无法更改的无奈当中。

巴恩斯在小说中提到,福楼拜曾和他的情人露易丝科莱(Louise Colet)书信讨论过他在写作《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时对风格的追求:“多少次,正当我以为我对风格成竹在胸之时,我却一败涂地。但我仍然觉得我还不能死去,除非我听到脑海中的风格轰鸣作响,淹没鹦鹉与知了的叫声”(Barnes 1995: 61)。此处福楼拜将鹦鹉与知了并置,暗指重复的、平庸的语言或语言风格。此时鹦鹉是他的对手,是要以自己的风格去对抗的庸常之物。福楼拜在与语言的长期共处中认识到,语言本身存在无法更改的不足。作家要表达自己,只能运用语言,而语言无法穷尽作家想要表达的风格:“鹦鹉/作家无力地将语言看作公认的、具模仿性的、无效的东西”(11)。此时鹦鹉的身份发生转换,成为与作家同病相怜的队友。

借由小说中布莱斯韦特寻访两只鹦鹉标本身份真实性而不得的经历,巴恩斯与福楼拜达成共识:对布莱斯韦特而言的真实,或对福楼拜而言的风格,是可以无限接近但却无法完全抵达的彼岸之地。在这部被他称为福楼拜立传的小说中,他努力揣摩并试图传递的,正是福楼拜看透写作的虚无、风格的不可抵达,仍旧知难而上的勇气。批评者尤金尼奥多纳托认为,“如果说费莉西泰是他的工作的献祭者,则福楼拜也是他的工作的献祭者”(Donato 1984: 720)。对费莉西泰来说,主妇的女儿维尔吉尼是她宗教信仰的最初引领人,她苦命的外甥维克多尔是她通往外部世界想象的媒介。鹦鹉露露一方面是圣灵的化身,是她宗教信仰的象征;另一方面,这来自亚美利加洲的爱鸟凝聚着她对外部世界的遥远想象。因此露露是她关于宗教、关于外部世界所有想象的标的物,是她全部精神生活的起点和终点,也是她甘愿为之奉献一切的对象。鹦鹉之于福楼拜,既是他的对手,又是他的队友;既是他一直在用却自感永远无法得心应手的语言,又是他呕心沥血从未放弃追求的风格。尽管明知无法最终抵达,福楼拜仍始终坚持为风格而战。除去为福楼拜立传,这部小说也是巴恩斯作为一名写作者,情愿追随前辈作家的自我宣言。福楼拜的命运,是每一个后来的巴恩斯无法逃脱的命运,但写作是他们甘愿承担的责任。

三、“性的不可靠”

性的可靠与否,因其极致的隐秘性,若非当事人有意透露,它的真实性是非常难以确知的。而这类现象若有鹦鹉参与,因其能言人语的本领,则大大增加了私情泄露的机会。在《福楼拜的鹦鹉》中,鹦鹉并未直接参与婚外私情的场景,但在巴恩斯笔下,鹦鹉标本身份真实性的不可知,对应布莱斯韦特妻子埃伦出轨与否的不可知。不可知既满足文中叙事者与自身和解的需要,又是后现代语境下不确定的叙事者的特有表达。鹦鹉意象与“性的不可靠”的关联,常发生在男女私情泄露的场景中。鹦鹉因其能言人语的能力,不小心泄露了某些不能见光的情感关系,有意无意充当了此类事件的旁观者,甚至监督者,左右了故事的进程。这类鹦鹉角色,类似巴赫金(M. M. Bakhtin)的分析中阿普列乌斯(Apulcius)的《金驴记》(The Golden Ass)里鲁巧变身驴的角色(巴赫金 2009: 308-311),或者《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里耐莉的角色,他们以介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身份,实现叙事视角的转换或补充,在故事搭建中起着贯通情节的重要作用。《福楼拜的鹦鹉》的主要叙事者布莱斯韦特,刨根问底想要获知鹦鹉标本的真实身份,想要获取关于鹦鹉、关于福楼拜的确定性认识,一路遭遇重重障碍。布氏开始这段寻访福楼拜生平之初衷,一是收集资料为自己喜爱的作家立传,二是抚慰自己因妻子去世而难以缓解的悲伤情绪。可是在寻访之初,他就不幸陷入关于鹦鹉身份真实性的谜团中。关于他的妻子埃伦,从他吞吞吐吐、语焉不详的叙述中大致可拼凑出的故事如下:埃伦一直持续着婚外情,常为此对丈夫撒谎,但二人并没有关于此事坦诚交谈。除此之外,她是个尽心尽责的好妻子。有关埃伦撒谎,小说里不无幽默地提到,“她匆忙跑去看电影,而我俩都清楚电影院马上要关门;她七月里去赶冬季特卖会;她想去堂姐家小住几天,而人家从希腊度假地寄来的贺卡第二天一早就到了”(Barnes 1995: 196)。她的这

些小花招明目张胆,但丈夫从来没有拆穿。小说中,埃伦是否不忠与鹦鹉标本是否真实,存在着隐性对应关系。

关于鹦鹉与“性的不可靠”的叙述,可追溯至奥维德《恋情集》,其中第二卷第五首至第八首,诗人将情人的背叛与情人的鹦鹉的死亡相邻并置,吸引读者从男女感情伦理方面加以考量(Ovid 2014: 58-64)。自奥维德之后,多有将鹦鹉形象与女性不忠相联系的文学叙事。这类以“女人的伎俩”(The Wiles of Women)为主题的叙事传统中,典型例子是印度民间故事集《鹦鹉故事》。与布莱斯韦特的妻子埃伦相比,其中的女性有不同遭遇:富商米耶蒙远行,留娇妻胡吉斯塔在家。胡吉斯塔一日在阁楼上眺望,与骑马经过的王子相见并相恋。自此她每日傍晚都梳洗打扮,意欲出门约会情郎。不料丈夫的鹦鹉每日都在她临出门时讲故事阻止她出行。故事一讲讲一晚,胡吉斯塔终未能得见情郎。但当丈夫返家时,鹦鹉仍将她越界的情感告诉了主人,主人盛怒之下将娇妻一剑刺死。

这个故事中鹦鹉充当着监督者、立法者的角色,胡吉斯塔的命运为鹦鹉所操控,鹦鹉是全知者。而在布莱斯韦特与妻子埃伦的故事中,实体的鹦鹉并未直接现身,但他们故事的发展——至少在布莱斯韦特的经验中——却离不开鹦鹉。布莱斯韦特一直纠结于福楼拜的鹦鹉身份的真实性问题,因为这关乎他如何理解埃伦出轨与否的问题。

《鹦鹉故事》中的胡吉斯塔并未做出身体上的越轨行为,但在连环穿插的故事演进中,她精神上的越轨一步步加深,最后受到丈夫惩罚。而埃伦的行为则较模糊:首先布莱斯韦特承认,他们夫妻二人并未就埃伦的不忠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关于此事的一切都出自丈夫对妻子行为的观察和想象;其次埃伦从未在情感上表现出任何异常:既没有对情郎的依恋渴望,也没有对丈夫的厌倦冷落。相反,除了秘而不宣或许存在的身体出轨,她是个尽职尽责、情绪稳定的好妻子。前一个故事结尾,丈夫杀妻后出门做了隐士,他了解到实情并做出了保全自己尊严的决断。后一个故事中,丈夫纠缠在他杀死妻子(为妻子实施安乐死)的愧疚中难以自拔。关于为埃伦实施安乐死一事,在布莱斯韦特的思维中有两次重要的转化,发生在他对鹦鹉身份真实性的求索过程中。他参观主宫医院时见到第一只鹦鹉标本,认定那就是福楼拜创作《一颗简单的心》时曾经凝视过的那只鹦鹉,他的感受非常美好:“这只并不出众的绿色鹦鹉以一种既普通又神秘的方式保留了某种东西,使我觉得我几乎早已了解了这位作家。我既感动又兴奋”(Barnes 1995: 8)。他的感动和兴奋来自他认为这只鹦鹉曾和他热爱的作家发生过联系,而这联系现在又发生在他和这只鹦鹉之间。最令叙事者欣慰的是,此时有一个实体(即主宫医院的鹦鹉标本)与他心灵中的鹦鹉相呼应,他获得一种确定性,觉得“感动又兴奋”。此时鹦鹉的身份与埃伦的问题并未发生关联。在布莱斯韦特看来,二者是确切的、各自独立的:这只鹦鹉标本就是福楼拜借用过的;埃伦出轨是既成事实。直到他在克鲁瓦塞的福楼拜故居看到第二只鹦鹉标本,他持有的确定性被破坏。他认定必有一个为真、一个为假,并不惜为此多方求证。他求证鹦鹉身份的真实性,是因为潜意识里他求证埃伦对他不忠的真实性。此时鹦鹉身份真实与否和埃伦忠贞与否产生第一次转化。布莱斯韦特自己承认:“埃伦的故事是真实故事;也许甚至这就是我给你们讲述福楼拜的故事的原因”(95)。福楼拜的故事、鹦鹉的问题,关乎他如何理解埃伦的故事。对他来说,确认鹦鹉身份的真假=确认埃伦出轨与否。他继续求索,拜访了福楼拜协会的秘书安德鲁先生。安德鲁先生点拨了两件事:第一,并不一定符合《一颗简单的心》里的描写的鹦鹉就是真实的,因为福楼拜完全可以在创作中变动眼前的现实;第二,福楼拜很可能写完那个故事后就借把借的标本还给了自然博物馆,现在两处展示的鹦鹉很可能都是筹建时工作人员照着《一颗简单的心》里的描写去自然博物馆借来的。安德鲁的一番话几乎扑灭了布莱斯韦特获取唯一真实的可能性,他以为的真实物很可能是以虚构物为参考构建的。正如学者布兰尼克尔(Bran Nicol)所言,“这正是对物的指称先于指称物本身而存在。或借用鲍德里亚对后现代性中此类问题的概括,‘地图先于疆土而存在’”(Nicol 2009: 117)。布氏最后还是怀着一线希望去往自然博物馆,期待凭直觉做最后的辨认。然而,在灯光昏暗、气味复杂的顶楼陈列架上,他看到了三只年久褪色的亚马逊鹦鹉,它们“像三位充满疑惑、目光尖刻的老人,满是头屑、寡廉鲜耻”(Barnes 1995: 228)。一切都更加模糊、复杂、无从辨认。他只好承认,“这既是答案又不是答案;既是结束又不是结束”(227)。此时完成了第二次转化:鹦鹉身份真假不可知=埃伦出轨与否的不可知。这一转化帮助他完成了最后的解脱。他一直为自己对埃伦实施安乐死良心不安,虽然事实上他面临的是两难选择:他不杀她,她在白白承受无意义的痛苦;他杀她,他是残忍的复仇者。就像《鹦鹉故事》里的丈夫,因为妻子的越轨行为将她一剑刺死。而两个“不可知”让他领悟到,事物的真相很多时候无法确知。他最终与自己心中的创伤达成和解,放弃思考埃伦出轨与否的问题,如此他才得以从作为“杀人犯”的身份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为患不治之症的妻子减少病痛而实施安乐死的丈夫。

在这类有鹦鹉参与、关于女性性背叛、被学者

佩里以“女人的伎俩”归类的故事中,鹦鹉及女性的结局常不尽相同。据《乌尔都语民间故事集:鹦鹉故事、僵尸鬼故事》的译者孔菊兰介绍,现存乌尔都语版的《鹦鹉故事》是于19世纪初由梵文版编译而来,主要流传于南亚次大陆穆斯林社会中。据介绍,梵文版与乌尔都语版故事结构类似,但结局却截然不同。梵文版中,丈夫最终原谅了总想与情人幽会的妻子,二人结局幸福;但乌尔都语版结尾,如前所述,妻子因精神上的越轨被丈夫一剑刺死。孔菊兰认为,“前者反映了印度教的宽容,后者表现出伊斯兰教的原则性和嫉恶如仇的世界观”(波赫西-海德利、阿里乌拉 2016: 4)。依照佩里的归类,此类故事中的鹦鹉有监督者形象,也有受害者形象。受害者形象一般是鹦鹉不小心透露了主人越轨的信息,施施以惩罚,甚至处死。再观《恋情集》第二卷第五首至第八首可见,第六首“悼念情人的鹦鹉”所处位置颇为微妙,其前一首是科琳娜的背叛,其后两首是诗中诗人的背叛。这难免引读者猜测,或许该鹦鹉因其能言人语的缘故走漏了风声,被某位处死。于是科琳娜或诗中的诗人,就不得而知了。《福楼拜的鹦鹉》中作为监督者和立法者的两只鹦鹉标本,在埃伦的故事中是以对它们身份真实性的认知为基础来建立思考的。故事中可能的性背叛者埃伦接受丈夫施予安乐死而死,丈夫因此愧疚难耐,终因探索鹦鹉身份的真实性问题而获解脱。然而值得一提的,布莱斯韦特是不可靠叙事者,然而自己在书中承认的“犹豫不决的叙事者”(Barnes 1995: 100),他也曾吞吞吐吐地宣称,“我没有杀死我的妻子”(109)。这让埃伦或许存在的性背叛以及她的死变得难以确知,呈现出巴恩斯式模糊的真实性。

四、“自我的身份”

后现代叙事者,不同于传统叙事者,他们的自我身份表现为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布莱斯韦特兼具叙事者身份和小说主人公身份。在对鹦鹉标本身份真伪的追索中,细节的展开指向求证过程和开放心态的重要性。而确定性结论,既是无法确知的,也是不必苛求的。模糊的接纳,反映出确定性瓦解之后,一种更为贴近现实的心理模式。在一次主要关于巴恩斯另一作品《英格兰,英格兰》的访谈中,巴恩斯曾提及蒙提派森,或称巨蟒喜剧团,并承认他的这部小说是一部蒙提派森特色浓厚的作品(Guignery 2009: 28)。原载于1998年8月30日《观察者报》(Observer)的该访谈取名为“他转向派森(但不是福楼拜的死鹦鹉)”(He Turns Towards Python (But Not the Dead Flaubert's Parrot Sketch...))。该标题反映出蒙提派森喜剧短剧“死鹦鹉”与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之间的某种内在(或外在)通约性。“死鹦鹉”为该剧团创制的飞行马戏团系列(Flying Circus)电视情景剧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集。虽然在系列电视情景剧之后,蒙提派森又创作完成多部电影,但该剧团的主要喜剧风格一直延续自飞行马戏团时期。在内容上,他们颠覆或攻击的对象大到英国的等级制度、宗教机制、学术领域,小到日常生活中面试、看病、购物、用餐等场景。当代人生活中面临的种种禁忌、困境、陈腐做派、不合理现状都被他们拿来攻击调侃,并且无所不用其极。

《福楼拜的鹦鹉》中的鹦鹉以动物标本的身份出场,其中的矛盾在于:两只标本中究竟哪只是福楼拜写作《一颗简单的心》时借用过的。而“死鹦鹉”中顾客向宠物店店员投诉他刚刚买到的死鹦鹉是死的,却被店员以各种理由推搪。此处的戏剧矛盾是:这只鹦鹉究竟是死是活。在《福楼拜的鹦鹉》末尾,布莱斯韦特四处寻访无门,后经过拜访福楼拜协会的秘书安德鲁先生及参观福楼拜当初租借鹦鹉的鲁昂自然博物馆,他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无法得到确证的谜团。在“死鹦鹉”的最后,顾客无法忍受店员故意的颠三倒四、答非所问、歪曲事实,声明自己决定放弃关于鹦鹉的投诉。虽然两个作品探讨的中心问题不同,但不了了之的相似结局指向后现代语境中混乱战胜秩序、模糊战胜清晰的必然结局。

“死鹦鹉”和《福楼拜的鹦鹉》中,都存在“不可靠叙事者”,他们是重要的后现代叙事者类型,常通过对问题的延宕实现“不可靠叙事”。“死鹦鹉”的核心问题是鹦鹉的生死性问题。《福楼拜的鹦鹉》的核心问题是鹦鹉的真伪性问题。在前一文本中,顾客对买到疑似死鹦鹉的申诉遭到了各种延宕:当顾客声明鹦鹉死了时,店员说它只是在休息。顾客说那我叫醒它,无论如何也叫不醒时,店员说它被对方吓倒了。类似的真相的拖延长篇皆是:一方面顾客想证明鹦鹉是死的,另一方面作为“不可靠叙事者”的店员通过这些延宕来证明鹦鹉是活的。他们的对话虽充满答非所问,却实现了有效交流,并且产生反转。如观众所见,那只鹦鹉的确是死的。但坚持鹦鹉是活的店员的店员最后却占了上风。至此片末尾,顾客坦言:“我不打算继续我的投诉了,这一切简直太愚蠢”(Chapman 1989: 106)。《福楼拜的鹦鹉》中的核心问题是鹦鹉的真伪性问题。但自始至终,这个问题别人并不关心,除了主要叙事者布莱斯韦特自己。在小说第一章提出问题后,也是将问题延宕,悬置中巴恩斯加入了各种各样其他体裁的材料,吊足读者胃口之后才在最后一章回到起先问题的答案,且是并无定论的答案。其中对问题的延宕不是通过类似“死鹦鹉”中语言层面的搁置来实现,而是通过超语言层面的文学程式的变化实现的。这是巴恩斯尤为擅长的小说处理方式,以形式本身作为内

贺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日语 2202 徐若尧

钱塘大潮几回还,关山月歌总相忆。
国都花荣秋高爽,四境闾阖景致奇。
神州赤县新篇开,宏伟伟业风鹏起。
仓廪丰实民为主,德法并治适时奇。

十年劳苦无私心,皇皇万卷满公意。
淡泊守土比尧舜,一言兴国正如此!
巍然风骨续国魂,星移斗转九万里。
悯念苍生怀天下,筹谋复兴字字勤!

以青春之我,推时代之波

心理 2201 蒋明君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我深刻了解了国家的发展状况与未来方向,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在二十大对青年的寄语,“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习大大的深情寄语,为我们指导了前进的方向。为了不负党和人民的期待,我们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感悟与成长,将自己的发展方向与国家的发展方向深刻的结合在一起,实现个人理想的同时,为国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哪怕微不足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这十年,中国经历了太多太多……永远忘不了中国脱贫攻坚战场上无数基层干部日日夜夜废寝忘食,忙碌奔波的身影;永远忘不了冲在森林防火第一线不畏牺牲的消防员战士们;永远忘不了疫情防控第一线,无数人民挺身而出,以生命赴使命,护祖国的千万人民和大好河山。他们都是我辈楷模,是中国精神淋漓尽致彰显,国家繁荣富强也正是在这一点一滴的付出,奉献与积累当中,得以推进与实现。他们用自己体现了平凡铸就伟大的究极意义,值得我们学习与铭记。

李大钊有言:“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几十年来,中国带领人民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使我们的祖国变得越来越富强,这是几代人的努力,也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梦想。我们生于和平年代,没有经历战乱与流离失所,这是国家提供给我们的屏障。除此之外,我们还享受了很多祖国带给我们的便利,如公民的权利,法律的限制等等。但是也许是因为环境太过安逸,使得很多人不务正业,成天精神萎靡,导致网抑云文化,佛系躺平等风气逐渐盛行。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这是青春的年

倏忽秋又尽,今朝恰立冬

学前 2202 陈润馨

北风潜入悄无踪,未品秋浓已立冬。一转眼,秋天便成了故事,冬天变成了风景。穿过斑斓的秋,转眼,会遇见什么样的冬呢?

是落叶黄,寒风狂,还是花带露,月如霜,或是西风瘦尽,东篱菊晚……不妨随我看看,浅冬来临,万物的谢幕仪式。

人们常说,此时节,水始冰,地始冻,日照短,寒风劲。这不,小动物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为冬天的来临,储存粮食。且看那小鸟也知道冬天要来了,它们三五成群,从远处飞来,忽尔低头觅食,忽而昂首啼叫,忽尔奋飞追逐……犹如一群充满活力的精灵,打破了这看似寂寥肃穆的环境,也为冬日增添了些许生气。

不仅如此,每一种植物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谢幕方式。且看那“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红叶满阶,残枝枯树,所有的生命都需经过沉淀才会迎来新生,叶子的掉落,其实是对完整生命的诠释,落叶归根,只是完成了生命的沉淀。还有那银杏落叶,微风吹过,翩翩起舞,留下一道优美的风景线。各种落叶随风起舞,又缓缓落下,为大地添上了几许不一样的色彩。冬天的序幕也就此拉开。秋意虽未消,寒风凛然而至,说的便是这幅

向前走,别被定义

汉教 2101 张艺玮

少年是自由的风,恣意潇洒;少年就是少年,不被任何人定义。少年有百般形态,非一种可概括。每一位逐日移山的少年都有自己奋不顾身的热爱,花开向阳,每一份热情都会被见证。

少年就是少年,他们看风不喜,看夏蝉不烦,看秋风不悲,看冬雪不叹。只因他们是少年。时序轮替,唯一不变的是少年的身影。在历史的坐标轴上,少年的步伐永远坚定。少年应当攀高峰,观海潮,看云卷云舒,在醉人的朝阳下肆意奔跑,在柔软的月光下醉意舞蹈。春衫少年郎就该笑看风华,像月光,光彩耀人。少年本该登上山顶,拨开云雾,看遍世间美景,而不该被半山腰的陡峭摔下山,雾气缠了身。要不断向前走,拨开脚下的荆棘,别回头,看那些泥泞的路怎么走过来……

少年向来不识天高地厚,放眼处皆自负才高八斗,虽是自命风流,倒也坦荡无忧,我爱这样的少年,谦和而狂妄,骄傲又坦然。甫子寸笔下的少年不就是我心中的少年?是向上走的少年,是不被定义的少年,少年该有的骄傲与狂妄

纪,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如此惶惶不得终日,以刷视频,沉迷游戏等网络事物度日,着实是一种浪费与虚度的表现,着实不符合当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身份。正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古人的言论,不可谓不大智慧。诚然,享乐的确实使人心情舒畅,但这些事情明明是我们八九十岁都能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年纪,做这些虚度并且浪费时间的事情。适当的享乐可以放松身心,但过度的享乐就是在辜负自我。拿更多的时间提升自己,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趁时间还不算晚,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身为祖国的一份子,我们应为了更好地推动国家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需要努力提升自身实力,奠定良好的基础。学好专业课。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使我们能充分的吸收知识。做好笔记,在练好中国字的同时巩固了所学知识。每天列下清单,定小目标,比如记十个单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永远不要轻视水滴石穿的真理。

其次,我们应勇于尝试突破。大学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会遇到不同的人群与事物。所以我们何不立下一个新人设,做更多尝试,岂不美哉?正如爱迪生做实验,不断尝试,终于得到了一个能造福社会的发明一样。当然,我们的尝试不需要像爱迪生一样伟大,但是只要选择了尝试,就已经突破了自己,向更好的方向迈进了。

最后我们要不惧艰险,迎难而上。“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么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一路走来,遇到不少困境,但正因为它的无畏且面对,这才造就了中国式的逆袭。作为中国的一份子,我们也要像祖国一样,以中国风的姿态不惧挑战,勇毅前行。

“有理想”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担当”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能吃苦”是勤学苦练勇争上游,“肯奋斗”是奋发有为时不我待。这四个是我们应该必备的向上词条,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带着这四个词条一起前行,奔赴我们未知充满可能的前线。

我们生在红旗之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愿以青春之我,推时代之波。

景象吧!

这时的人们在忙碌着什么,是像李白一样悠然感叹“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白,恍疑雪满前村”,还是像陆游一样乐观面对“寸积篝炉炭,铁称布被绵。平生师陋巷,随处一欣然”。其实不然也,寻常百姓家在经历了秋收后,一般会开始冬藏。这作为一种传统,在《孝经纬》中有记载:“斗指乾,为立冬,冬者,终也,万物皆收藏也”,而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是这样解释的,秋季作物全部收晒完毕,收藏入库,动物也已藏起来,准备冬眠,简而言之,万物收藏,规避寒冷,此为立冬。

立冬,不仅是秋天的结束,也是对冬天的期许。也许这个冬天会很寒冷,但别因此放弃前行,要知道,冬天的每一步脚印都清晰可见。笑迎风霜,愈是寒冷,愈要绽放花香。不畏严寒,愈是坚韧,愈会收获美好。

四季变换,岁月流转,愿将杂乱的生活揉碎,融入初冬的暖阳,所有美好都将在冬天沉淀,但愿在这个凛冽的冬天,仍有一抹阳光相随,带给你温暖与陪伴。

尽在其中。朝阳追落日,余日追月光,时光追少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只有一次可以放肆的青春,在这一次,有无限可能。所以,我爱少年的狂妄,且永远为这时散出的自由又潇洒的气息感到骄傲与热烈。

走这一遍,去领略浪漫的风景,温柔的目光。少年啊,去做风吧,做不被定义的风,吹过大海,吹过鲜花,吹过山峰与树梢,将热情与向往带到爱的地方。少年啊,何必在意?我们本就不该被定义,要成为怎样的人,没有人能够阻挡,也从不是别人能够预见的。即使有人试图将我们逼入黑暗,用流言蜚语打击我们。但少年就是少年,不会因为流言蜚语低头,不会因为枷锁而被束缚。少年就是少年,是独一无二的少年!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少年有无限的可能,每个人都在发光发热,如同萤火一般,在黑暗中聚集便能照亮整片天空;如同火炬一般,少年永远热情似火。向前走吧,不惧山高水长,不惧流言蜚语,此后便如烟火般绽放,永远耀眼……

以历史主动精神实现创新发展

——观第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感

思政 2202 许媛媛

2022年10月16日上午举世瞩目、热切盼望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二十大的召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来讲,有着让众人期盼的特殊因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更是中国前进道路上的特殊路标。每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每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都产生着非同寻常的历史影响。可以说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不断完善自我的历史。本次大会将是党和国家踏上新征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社会将始终延续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行。

本次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

光明,任重道远。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亲眼见证了从十八大到现在以来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是党带领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是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拼搏奋斗、凝聚出的磅礴力量结出的果实。在这新时代的十年里,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使人们的生活更上一个阶梯;开展抗击疫情阻击战,最大限度的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把握香港大局,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

我们青年一代应紧跟国家战略部署,坚定不移的听党话,跟党走,以祖国为任,护佑山河安泰。将自己的理想与国家建设相结合,坚定不移的跟着党的步伐,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光彩。我们生逢其时,我们施展才干的舞台如此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如此光明,我们乘风破浪,必将行稳致远。

脚沾泥土,手撷芬芳

心理 2201 刘斯荣

他们置身现场,捕捉每一个精彩瞬间,见证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还还原真相,客观表达,坚守正义;他们一次次出发,记录时代;他们步履不停,传播世界各个角落的故事。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那天,绝大多数记者都像往常一样,行色匆匆地忙碌于电脑前、手机记事本上以及各个重大场合。是11月8日,中国记者节,像护士节、教师节一样,记者节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即使那天是他们的节日,他们并没有时间停下忙碌的脚步。

他们的工作有时看起来很“风光”,但更多时候是“出水两脚泥”,他们用一个个镜头点滴瞬间,采世界风云知百姓冷暖,扛“长枪短炮”展祖国变迁。我国央视战地记者梁玉珍,奔走于硝烟战火中,在战争现场采访,采访完,就蹲在地上写稿子,写完,就站在那里录制解说词。她一直觉得,离子弹越近,电视机前的中国人就能了解情况越详细。那些日子里,她不休息,追着危险跑,只为真实、详细、准确地将战场情况报告给更多人,救助更多人。还有记者崔松旺,为曝光黑砖窑,获取揭露真相的证据,解救被拐卖的奴工,不惜只身冒险,装疯卖傻,乞讨吃垃圾,把自己500元卖入黑砖窑,潜伏其中,最终协助警方抓获8名黑窑厂老板和招募人,解救了30名奴工。他们凭一己之力,帮助了无数困苦之人。

“记者”二字已不同于过去,仅仅报道某个事件已不能满足人们对信息的要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可以在网络上迅速获取最新资讯和新闻信息,也有传播新闻的能力。因此对新闻工

容,“将超语言的文学程式本身作为一种能指,来传达相应的意识形态所指”(步朝霞 2006: 76)。一系列的年表、动物寓言故事集、公认概念词典,甚至试题,本身就在传递某种复杂性。看似是事实的东西并不能传递真实,真实不可捉摸。直至小说结束,鸚鵡身份真实性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无从把握。换句话说,这个无从把握才是唯一的真实。如果说《福楼拜的鸚鵡》中鸚鵡真实性问题延宕的结果是模糊和不确定的话,“死鸚鵡”中鸚鵡生死性问题延宕的结果则黑白完全颠倒,这无疑向巴恩斯关心的“什么是真实”的问题提出了有力挑战。

在“死鸚鵡”和《福楼拜的鸚鵡》中,“不可靠叙事者”的另一叙事策略是“元”(meta-)或“后设”特色的运用。前一作品主要体现在其元戏剧(meta-drama)尤其是戏中戏(play-within-the-play)的表现手法上;后一作品主要体现在元批评的运用方面。“死鸚鵡”中间部分,顾客返回火车站投诉,那个工作人员说了一通不相干的话,于是顾客说:“抱歉,这完全不相干啊,不是吗?”工作人员回答说:“没错,可是要凑够一个30分钟的时间不容易啊。”似乎他胡诌一通的目的是在为片子凑长度。另外,短片结尾冒出一位军官模样的人,以滑稽的动作闪过,嘴里喊着:“同感,同感,太蠢了,简直太蠢了”(Chapman 1989: 106)。似乎是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给出评价。短片最后一幕是一个播音员,他正在舔食酸奶,镜头切换给他时,他匆忙放下酸奶,拿起桌上的稿纸。这一幕制造出了“戏中戏”的效果,似乎刚才看到的那个短片嵌套在一个更大的节目中。这几处安排将一些幕后的东西搬至前台,将构思过程以滑稽的方式外化。在《福楼拜的鸚鵡》中题为“爱玛包法利的眼睛”的第六章中,巴恩斯指出牛津大学伊妮德斯塔基博士对福楼拜所写的爱玛包法利眼睛的研究存在错误,并指出研究者这样轻率的判断与福楼拜本人颇费心思的描写比起来是一种傲慢的疏忽。在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称为“制作语句”(罗兰·巴尔特 2008: 131)的福楼拜的写作过程中,充满“西西弗斯式的循环劳作”(125),巴尔特认为这样的“语句历险也就是福楼拜小说中之小说”(131)。但这个历险过程在福楼拜的作品中隐而不现,他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完成性作品。然而无论“死鸚鵡”中的“戏中戏”手法,抑或《福楼拜的鸚鵡》中的元批评,都将这个历险过程外化,将创作者的思考和修改过程呈现给读者,让读者体会及分担创作过程的诸多可能性。戴维洛奇(David Lodge)把小说或戏剧中的这种“后设”行为比喻为行文和世界之间、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短路”(short-circuit),“造成这种短路的方法颇多,如明显的事实和露骨的虚构相结合,将作者和创作源泉问题引入作品,在运用传统的过程中揭露传统等等”(Lodge 1981: 15)。这些方法将本应发生在后台的东西前置,迫使观众/读者思考除作品情节之外的创作过程。在小说第七章中,巴恩斯借布莱斯韦特之口对后现代小说中常见的不可靠叙事和开放式结局提出质疑,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技术手段”(Barnes 1995: 99),而非表现真实。但随后布氏又无不风趣地承认他自己正是一位犹豫不决的不可靠叙事者。这可谓是对元批评的再批评了。如尼克尔所言,“这是后现代叙事者谴责后现代写作手法”(Nicol 2009: 119)。这样的“双重诡计”(119)是巴恩斯试图展现的真实的一部分。也有学者认为,“与自我指涉的怀疑主义比起来,关于不确定的智慧似乎是描述巴恩斯作品思辨性、质询性和颠覆性的更确切表达”(Groes and Childs 2011: 8)。巴恩斯在小说叙事中对不确定的认知和运用,反映出他作为后现代写作者开放的心态和身份;他可以是故事的创造者,也可以是旁观者,有时又是故事的评论者,甚至是毁灭者。在这种开放状态下,传统的单一身份的读者能够以多重身份参与到小说的阅读乃至创作中。然而巴恩斯这份彻底的、无限镜像的不确定,对不确定的不确定,除了具有“思辨性、质询性和颠覆性”之外,难免会让读者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中,这也反映出他本人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自身的焦虑和迷茫。

五、结语

鸚鵡因其重复性的语言的能力,在多个经典文本中承担特殊的文学功能。文学叙事中有关鸚鵡的三个普世命题——“人类语言、性的不可靠和自我的身份”也都与它的这一本领密切相关。《福楼拜的鸚鵡》中,巴恩斯对鸚鵡形象的塑造,是对文学传统中这一意象的继承。除此之外,鸚鵡能言人语却不表达意义的特性,使之与自然语言相连接,成为语言与意义断裂的隐喻,内含了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西方语言哲学的本质,也标示了后现代文学的理论基础。形而上学的崩溃,将语言与现实作逻辑同构的命题之崩溃。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是在语言中制造的。合乎语法的语言可能具备自治性,但可能对现实毫不尊重。表现在后现代文本《福楼拜的鸚鵡》中,鸚鵡语言与意义间的断裂,不可靠叙事者对意义的混淆,是以具体的语言事实对当代哲学问题确定性的消解。在这个意义上,鸚鵡意象与语言哲学,后现代文本是同构的。语言是鸚鵡的宿命,正如写作是作家的宿命。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鸚鵡》中书写出作家的无奈和困顿,但又绝不悲观。作为后现代写作者,他的同理心不在于感同身受或给出答案,而在于事无巨细的一一呈现。这或许就是巴恩斯言中“小说的真实”的全部意义。